

城市空间演变与文化记忆的互构关系

◎ 谢欣然

内容提要 城市空间的演变是一种历史书写的结果,亦是人类生命自我持存动态发展的成果。这个空间成为人类借以组织感觉世界经验和意识形态秩序的场所,其中必然凝聚着人类生命、生活时空的记忆指向。文化记忆作为城市的无意识而现身,它从心理学范畴中脱离出来,蕴藉着一种更为复杂多元的文化生产方式。本文试图以城市空间发展的整体风貌为阐述背景,以文化记忆的表现形式及建构实践为依托,重点梳理城市空间演变与文化记忆之间的互构关系。两者之间的辩证关系共同塑造着我们所识知的社会现实与文化类型,同时也涵括对面向时代的生存体验和生存困境的解答和表述,它们确立并呈现了城市演进过程中的自身形态及历史经验,构成了城市话语建构的崭新视角。

关键词 城市空间 文化记忆 互构关系

(中图分类号)I01;G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447-662X(2018)06-0079-07

DOI:10.15895/j.cnki.rwzz.2018.06.010

作为过去经验在人脑中的反映,“记忆”凭其积淀的浅层亦或深层的经验储备不断塑造着人类心态及精神气质。同时借助鲜活的感官数据和功能性知识支撑,记忆以“过去”消融了“未来”造成的不安紧张,并以此为文化的流变更新提供可能性条件。可以说,“文化动力的神秘之处及其核心就是记忆。”^①毋庸讳言,记忆不仅铸就了人类的心灵习性,而且提供了意识形态构造的崭新视角,在人类生活的文化定向中,记忆作为一种强大的文化要素承载着知识生产的逻辑原点。然而,当记忆在加强时间因素的时候,其内在持久力在抵抗时间侵蚀过程中遭受了削弱。遗忘、断裂、损毁等遮蔽记忆完整性的阻碍因素也就来到了前台,导致记忆的重新配置。质而言之,记忆在剧烈的不确定性当中开启了自身指向的多种可能性。这也就意味着记忆作为知识生产的过程,其富于活力和生产性的发展都来自它不断开放

以及不断重建的特征。在由后现代主义和全球化条件下的意识形态和文化象征所定义的新环境里,既有的经济现实、政治状况、思想立场无一不渗透进记忆的缔造之中。记忆不再局限于心理学范畴,而成为一种社会现象,在某种程度上,它已经同植根于人类日常生活的经验世界交叠在了一起,并且被引入到对文化观念和思想话语的探讨之中。

当全球化浪潮作为一种解放力量实现了社会经济的普遍进步,并引发人类生活世界的扩张时,一种新的占据空间的方式无疑正在孕育之中:地方性突破升级为一种大规模都市化的普遍浪潮,由此催生出真正意义上的现代化城市。城市作为人类历史和文化记忆持久性延续的重要载体,对于空间生产的

^① Jeanette Rodriguez and Ted Fortier, *Cultural Memory: Resistance, Faith and Identity*, Austin: University of Texas Press, 2007, p. 1.



研究应当置于城市文化记忆的构成语境之下。同时,这种“持久性”亦使社会空间中的规范、价值及其对意义和重要性的决定作用深入到人类最为私密的经验之中,使建基于个体意识机能基础上的记忆具备社会属性。这种记忆塑造着我们所能够理解的历史和现实,也提供了我们反观自身和世界的崭新视角。在此意义上,“记忆不仅仅是工具,也不仅仅是过程,它本身也可以成为舞台,甚至构成一种创造历史的力量”。^①诉诸人类记忆与社会空间渗透互融的观照,不仅可以探赜到个体或群体内心对于城市空间的心理体验和文化想象,而且有助于揭示城市发展史及其空间表现形态中蕴藉的文化认知功能。

一、城市空间起源:记忆艺术与死者纪念

为了深刻把握城市发展脉络,有必要将这一探究活动延伸至城市隐喻性象征体系的各个方面,从深层的文化记忆视角中感知城市空间变迁的表达方式。“文化记忆”由德国学者扬·阿斯曼^②于20世纪90年代首次提出,它主要以记忆作为思索文化传承的切入点,从而借此契机探赜社会构成和文化变迁的规律。文化记忆与文明演进交融互构,只有当城市或国家形成之时,文化记忆才得以呈现。同样,文化记忆在历史长河中的持续变迁亦生动印证着人类社会的发展进程。阿斯曼认为“文化记忆是一个集体概念,它指所有通过一个社会的互动框架指导行为和经验的知識,都是在反复进行的社会实践中一代代地获得的知识。”^③事实上,城市的产生有其自身历史谱系,具有主观精神因素和客观生产力因素共同关联的价值体系和发展动力,正如英国地理学家阿兰·R. H. 贝克所说“往日景观的形成与意义,反映与建构了人们工作与生活于其中并加以创造、经历与表现的社会。但就其留存(或通过留存)至今而言,往日景观作为文化记忆与特性的组成部分之一,具有延续的意义。”^④更多有关城市起源问题的分析模式仍然受到某种历史学“客观性”或普遍有效性等意识形态和方法论的阻碍,一种历史学的视角促使学界将城市起源问题统摄于早期城市遗迹的总体性研究之中。在这一过程中,历史思

维获得了学术界充分的话语地位。然而后现代主义却极力否认客观性这一主张,尽管历史研究自有其方法的合理性,但在朝向历史研究以外的社会、政治、文化和日常生活复杂性等探讨方面,这种历史化趋向的理论方法却限制了重申现实的内在差异性。当意识到记忆的非专业性因素在更为多元、更为民主的人类生活领域内所展现的作用之后,发生在人文学科内部的思想论争也因这种新的意识而被扩大了。以文化记忆为参照框架去描绘城市空间形式的建构过程,有利于拓展城市在当下社会交往和传承中所发挥的积极意义。

对于城市空间起源问题的理解和讨论,有必要摆脱考古学某些机械而单一的认识论模式,应当在最精深的文化层面耙梳贯穿城市发展的可理解性原则,使这些文化要素和维度获得在认知空间和表征空间中的实际作用。城市空间现象的萌发与原始初民传统的心理诉求、习俗的心照不宣和传承的往复循环休戚相关。由古至今,人类作为灵长类动物进化的高级产物有诸多契合动物性的行为表现方式,在所有社会现象中,个人的生理学现象成为人类原始本能的彰显。但是,即便处于人类文化的最低阶段也会比动物所获得的某些技能繁冗的多。这里需要提供的是有关人类思想或信仰的解释,其中比较典型的表现就属人类在涉及“生命”问题上所建立的某种经验性文化形态。自原始社会伊始,对死亡的思考就始终萦绕人类左右,但由于社会发展水平和思维逻辑的局限性,关于死亡现象的考量还不足以深刻地融汇到理论反思和文化解读的论域之内,这亦成就了将死亡观理解囿于非自然化宗教神话范畴的策源背景。原始宗教内死者纪念产生的原因,最主要是为了在低级文化阶段对抗自然环境随时萌发的无秩序性。随着人类对自然规律的认识开始活

^① 陈平原《都市想象与文化记忆》,《中华读书报》2008年10月22日,第12版。

^② 扬·阿斯曼(Jan Assmann),又译为简·奥斯曼。对具体译著的引用,仍沿用原译者译法。

^③ [德]简·奥斯曼《集体记忆与文化身份》,陶东风主编:《文化研究》第11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1年,第4页。

^④ [英]阿兰·R. H. 贝克《地理学与历史学:跨越楚河汉界》,阙维民译,商务印书馆2008年,第150~151页。



跃,社会力和自然力的角逐开始出现一种制衡点。恩斯特·卡西尔由是言之“对生命的不可毁灭的统一行动感情是如此强烈如此不可动摇,以致到了否定和蔑视死亡这个事实的地步。在原始思维中,死亡绝没有被看成是服从一般法则的一种自然现象。”^①对死亡现象的疑惑和对逝者的敬畏构成原始初民死者纪念时间性或阶段性的标志前缀。“万物有灵论”作为原始部族人们对灵魂和神灵的普遍信仰,使他们坚信人的生命在时空中根本不存在确定的界限,因此,生者最高宗教任务之一便是在家族成员过世之后选择固定地点厚葬死者,并定期返回安葬地告慰死者灵魂,所以围绕墓穴或者坟墓周围集结而成的原始聚落成为首批人类固定的居住地。考古发现证实,居住聚落的形成蕴藉着丰富的宗教内涵,共同的祭祀礼俗与宗教信仰,将原始先民定期或永久性地聚集在一起。^②例如,近年我国东北兴安岭嘎仙所发现的石屋,以及在蒙古国境内所发现的阿尔泰山北麓赫赫洞窟,均是远古人类的祭祀圣地和固定居住地。^③以其为中心举行的崇拜祭祀活动在当时具有强大的宗教感召力和震慑力,属远古社会基于“仪式性关联”建构起来的时空场域。直至现代,蒙古民族中还有一个小部落仍旧保留对洞窟崇拜、祭祀的遗俗。另外,法国南部地区的阿里埃日的“三兄弟岩洞”内就保留了一幅身披鹿皮,头戴鹿角的男巫壁画。据《英国民俗》记载,由这样的男巫举行的祭礼直到公元7世纪依然存在。^④这些岩洞是社会性和宗教性融为一体的符号和象征,可以认为它们的存在亦是空间建筑概念出现的表征。

扬·阿斯曼认为在文化记忆内存有一种“凝聚性结构”,它在时间层面上,“把过去和现在连接在一起,其方式便是把过去的重要事件和对它们的回忆以某一形式固定和保存下来并不断使其重现以获得现实意义”;在社会层面上,“它包含了共同的价值体系和行为准则,而这些对所有成员都具有约束力的东西又是从对共同的过去的记忆和回忆中剥离出来的。”^⑤一种经久不衰且有道德强制力的社会性回忆形式借助死者纪念的方式使生者和死者达到了想象中的联合,集体通过祭祀手段将对灵魂的虔诚观念和忧惧心理植入到其成员意识中去,这种观念

的衍生通过反复推行祭奠仪式使个体意识到死者纪念是必要行为,从而使无数个体汇聚成一个基于集体认同而在行动上趋于一致的集体主体。因此,在一定意义上可以理解为,人类根深蒂固的集体化记忆是城市发展的基本条件之一。虽然原始初期社会低下的生产力不易有固定居所,但死者却理所当然地在某一地点拥有永久性“居住”的权利。无可讳言,坟墓作为承载家族内部私人性质的纪念性空间,固定在某一个地方,它以号召性的力量极易引起原始初民连续性聚落的崛起。死者纪念蕴藉着代代相传而又经久不衰的宗教道德责任,它使死者与家族以一种绵延久远的方式得以连缀,这种初期文化表达构成了以祀神祭祖为核心的原始聚落展开模式。精神而非物质性的居住动机最直接地植根于历史所限定的不可化约的宗教性心理诉求之上。原始聚落是城市产生的原点,城市空间毋宁说滥觞于原始初民对死者记忆的推崇和关注。坟墓或墓穴等作为死者纪念的标志性空间是原始祭奠活动的发生场域,共同的祭祀习俗和宗教信仰包裹着强大的感召力和震慑力,使得集宗教性和社会性于一体的人群聚拢模式成为了最早的空间构筑动机。从祭祀传统可以窥见城市空间创建过程中宗教性的助推作用,礼仪风俗汇聚的背后衍生出人类彼此间更紧密的生活交集,虽然不足以成为论证城市空间诞生的全部要素,但却为初始城市空间的出现提供了以集群为基础的文化记忆和想象意义,此种意识形态领域所具备的深刻内质超越了城市形成的物质性关联。社会心理的虔诚情感或心理诉求虽有其阶段性、变化性等趋向形式,然而世代沿袭的神圣精神和世俗权威的记忆却早已内化为集体无意识,成为推动城市空间形成的积蓄性力量。

① [德]恩斯特·卡西尔《人论》,甘阳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13年,第142页。

②④ [美]刘易斯·芒福德《城市发展史——起源、演变和前景》,宋俊岭、倪文彦译,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2004年,第5、6~7页。

③ 张志尧《阿尔泰山前时期的萨满岩画》,马明达、纪宗安主编《暨南文学》第8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3年,第4页。

⑤ 黄晓晨《文化记忆》,汪民安主编《文化研究关键词》,江苏人民出版社2007年,第352页。



二、城市空间的诞生:安身立命的集体 诉求与宗教功能的升级

中世纪城市既同原始状态下的宗教性聚居部落区别开来,也同工业时代的资本主义城市风格迥然有异,因而成为城市空间演变历史中不容忽视的一环。中世纪欧洲缺乏强有力的政权来维系城市内部的稳定团结,封建割据势力纵横捭阖、摧枯拉朽,将欧洲人民拉入动荡不安与混乱窘迫的“黑暗时代”之中。这一时期城市空间内部塑成的集体性价值体系与社会政治局势发生冲突,而大众群体全新的心理诉求却在很大程度上成为城市形式改造中鲜活的经验。自罗马帝国覆灭之后,经过五个世纪的战乱折磨,欧洲社会催生出渴求社会安定的重建意识开始对过往经验进行重新洗牌,直接影响了城市的发展路径。用鲜血与牺牲书写的历史事件在国家及民族的记忆中占据无可替代的地位,但这些记忆不只是创伤性的,更重要的是它们在政治和文化发展中具备的深刻信息价值。战争所引发的苦难与恐惧成就了一个社会性、全民化的事件,而所有亲历者将这段动荡不安的历史记忆聚合起来,便成为这一时期欧洲人民关于中世纪的共同记忆。因此,“从这个时代无以疗救的苦难和恐怖中,生长出一些特殊的、新的态度来看待生活。这些态度后来极其强有力地影响了西方世界的全部重要社会机构和制度的孕育发展,尤其影响了西方城市的发育。”^①如果对中世纪城市空间配置进行整体性剖析,城市安全防御的功能性结构形态则成为这一阶段规划的主导性诉求,用于抵御外敌入侵的堡垒或城墙等空间景观成为战乱危机中最普遍的稳定力量。同时,在人类理性逐步强化的时代,神秘主义的力量并没有衰微,正相反,宗教力量反而迅速崛起,并贯穿中世纪城市发展的始终。作为当时体系完备的机构和组织,教会在无以疗救的苦难与恐惧中所体现的自治力量深刻影响了西方城市的生长。

中世纪欧洲人遭受各方封建势力的蚕食,面对群雄割据和蛮族劫掠,城墙堡垒成为保障生命安全的关键性力量。诸多人口汇聚地往往分布在城墙内部或被囊括在借助自然掩护地势而修建的壁垒之

中,受益于城墙防御和天然屏障的庇护,数个部族为寻求自保纷纷在此安营扎寨,组成政治意义上的更大共同体。新的空间格局在满足军事防御需求之余,亦成为权力统治的符号象征。由于土地兼并和战乱不断,农民不得不逃离自己的土地转而依附于封建领主,受惠于封建领主的庇佑,领地之中的农民得以享有安全的生活,而封建主则依靠农民缴纳赋税及保有地上的生产所得维持生活。封建主和保护民之间利益共享的局面由此形成,正是基于此种自给自足的生产模式,永久性居住地点逐渐得以确立,而以神权机制为主导的聚居模式则趋向边缘化。跨越地域差异和文化差异的族群共同承担起人性的苦难,各区域民族之间交往日趋频繁,彼此间的影响渐趋加深,人类命运被紧密地联系在一起。这种额外的馈赠令高度不稳定的政治形态趋于平静,以此为中世纪城市的诞生奠定了人口基础。虽然将劳动力束缚在土地上的封建聚集模式一定程度上禁锢了个人的自由,然而此种坚固依附关系的生成大大提高了农业生产效率,使经济得以从战争的巨大冲击中恢复。约翰·伦尼·肖特在分析早期城市发展情况时指出“这些早期城市出现和存在的基础是威慑作用和宗教影响……在城市里,控制作用一目了然:城墙把人们分隔内外。宗教的作用在于通过典仪、假借宇宙的要求建立社会秩序。”^②在他看来,早期城市是世俗权威和宗教势力双方合力的产物。中世纪封建割据严重,王权式微,唯一强大而持久的组织体系就是教会。对于当时的民众而言,宗教成为修复人性裂痕以及基于安全信任重建人类共同体而建立联系、分享记忆和共担指责的信仰归根。在战争和屠杀所造成的创伤性经验中,愈来愈多的人群从所信奉的宗教中完成自我救赎,并能够通过宗教慰藉找寻对创伤性过去的一致认识。作为政治组织结构,教会转化成抵御外来侵袭的精神基石,并且保证了个体自我认同和集体互动的有效性与合法性;作为经济生活的展开场所,教会“什一税”成为教会

① [美]刘易斯·芒福德《城市文化》,宋俊岭等译,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2008年,第15页。

② [英]约翰·伦尼·肖特《城市秩序:城市、文化与权力导论》,郑娟、梁捷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15年,第20页。



经济收入的重要来源,用以维系整个社会体系正常运作;作为宗教信仰的归属,教会保护众生的博大精神为饱受摧残的民众带去了精神抚慰。从文化记忆的理论角度考量,宗教在价值意义及行事风格等方面使城市的发展被赋予了强烈的象征意味,民众对其精神上的依附在社会向前推进的过程中从内部逐渐转移到外部,这就呈现为一种渴望开拓精神家园的冲动感。中世纪城市的中心区域被用以建造教堂,民众的居住社区也普遍沿着宗教场所分布,这种地理布局使得城市的公共空间承载了更多人文关怀的意味。当时城市诸多机构设施之所以能够建成,完全离不开教会的支持,“中世纪城市的实质就在于教会和社区密切结合起来,共同去追求基督教所主张的那种神圣生活。即使这种结合尚且缺乏基督教的理想,它也依然为进一步形成这种理想而产生出必要的组织机构和建筑设施。”^①随着宗教礼仪、信仰及组织规范化空间的建立,一套普遍而抽象的行事规范渗透于该空间结构之中,并由此构成了共享价值观念和以群体信仰为重要参照的社会结构。欧洲城市景观中神圣空间的兴起使教堂在城市中大量涌现,并且成为欧洲中世纪城市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

文化记忆作为人格化了的文化活动的整体性彰显,是在特定场所被创造出来的过去经验,它对于空间维度的建构有着不容忽视的意义。扬·阿斯曼认为“记忆,使人类得以升华在集体和团体中,而生活在集体和团体中又令我们能够创建记忆。”^②记忆同历史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是集体、民族、国家得以成型的基础和策源地,个人或集体在社会化进程中也不断更新着记忆。记忆证实着客观存在的过去,也赋予了以过去为基点重构现实经验的行为以合法性意义。空间则成为记忆的载体,作为保存、整理、唤起对过往的启发性力量构成了城市景观的一部分。在某种程度上,城市设计师就担负着记忆城市的职能,尤其在中世纪晚期,仿效古典时代的城市规划模式又再次兴盛起来。譬如15世纪,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发现了由古罗马建筑师和工程师马尔库斯·维特鲁威·波利奥(Marcus Vitruvius Pollio)编写的西方古典时代唯一留存下来的建筑全书——《建

筑十书》遗稿。L. B. 阿尔伯特·伊尔·菲拉雷特、斯卡莫齐等人师法维特鲁威,发展了“理想城市”理论,这些方案设想对欧洲后来的城市规划思想颇有影响。除了理论性的文字,城市地图的绘制所承载的记忆指向也十分明确。对于中世纪城市而言,圆形和方形结构可以称得上是两种理想化的城市形态,因为它们基本反映了中世纪城市所承载的象征意义:圆形代表世俗权威,方形代表宗教势力。为了抵御外来侵略,城墙建造耗费了公共支出的绝大部分,在节约开支的同时为了保证预先规划面积的最大化实现,多数防御式城墙的修筑通常呈现圆形或者半圆形状态,英国的里斯托默尔城堡就是这类防御工事很好的代表;而方形建筑则脱胎于罗马长方形会堂建筑,它的风格普遍呈现庄严肃穆之感,其基本形象采用类似古罗马拱顶和梁柱相结合的结构。此类建筑以教堂居多,具有代表性的有意大利的比萨大教堂、法国的普瓦提埃大教堂和阿耳大教堂、德国的沃姆斯大教堂和美因茨大教堂,以及英国的达拉姆大教堂等。就具体中世纪城市地图而言,绘图者很少考虑建筑群间精确的空间关系,这是由于其目的往往是借助抽象方式展现道德训诫,因此,中世纪城市图像的象征性远远超出其精确性。^③也许我们无法按照现代城市绘图学的标准去衡量中世纪建筑,它们的构建有着更复杂的动机,因为其本质和意向始终指向一种绝对明确的文化记忆。

三、城市空间的扩张:现代性体验与记忆危机的萌发

现代性作为一种卓殊的文明模式倾向于将自身与对传统的反叛缠绕在一起,两百年以来,革故鼎新、骚动不安始终是现代生活的基本事实。从历史断代角度论述,现代性承载的是从中世纪封建主义到现代主义所暗含的错综繁杂的时空关系。因此,

^① [美]刘易斯·芒福德《城市发展史——起源、演变和前景》,宋俊岭、倪文彦译,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2004年,第287页。

^② Jan Assmann, “Communicative and Cultural Memory,” in Peter Meusburger, Michael Heffernan and Edgar Wunder, eds., *Cultural Memories: the Geographical Point of View*, Heidelberg, London & New York: Springer, 2011, p. 23.

^③ K. Lilley, *City and Cosmos: The Medieval World in Urban Form*, London: Reaktion Books, 2009, p. 44.



思想摆脱封建化意识形态朝向推崇理性的方向行进成为文化领域发展的逻辑。从社会变迁角度观察现代性,强调的是国家或城市体制运行状态下发展或改进的因素。而现代化作为现代性的动态表现形式,则标识着社会内部正发生着急速的功能变迁,工业化、科技化、城市化等推动因素则成为解释这一现象的重要指标。现代性作为一场革命性巨变引起社会领域和文化领域研究范式的双向突破,它并非单一改善了人类生存环境,毋宁说,其对自由意志的宣扬正在价值观念和道德原则领域构成了自我确证的话语系统。诚如伯曼所述“所谓现代性,就是发现我们自己身处一种环境之中,这种环境允许我们去历险,去获得权力、快乐和成长,去改变我们自己和世界,但与此同时它又威胁要摧毁我们拥有的一切,摧毁我们所知的一切,摧毁我们表现出来的一切。”^①对于现代性的寻觅不单纯是揭示此阶段生活方式和文化心理状态的蜕变,而且有必要对来自现代性渗透造成的后果进行干预性体察。齐美尔在《大都会与精神生活》^②一文中认为,现代性观念已经在大都市这样的资本主义空间中形成了某种特有的文化逻辑和社会组织原则,而只有以大都市为背景探赜现代主义复杂深远的内涵,才有可能传达和表述现代性及其后果之间内在的因果关系。无可讳言,城市作为现代性充分发展的阶段性成果,是多样化现代精神特质的展现场域,只有当城市成为公共辩论的话语平台,围绕现代性展开的思想论争和意识形态冲突才能获取某种新的表述。

作为文化产生的基础性配置,大地景观为文化存活提供了物质性发生场域,同时,文化又在不断强化着人与生存空间的普遍联系。城市之于现代人,对于观察者而言体现为一种与景观联系在一起的记忆。伴随城市化进程的愈益加快,原先从土地契约中产生的财富让位于由城市商业贸易所带来的利益。这样的变化同时诱发了社会结构的转型,资本的急剧扩张使对生产的颂扬在城市中得到了蓬勃发展。城市迅速成为与日常生活和全球化进程密切关联的生存空间,因此在权利的天平上胜过了乡村。随着便捷化交通网络的成型和现代户籍制度的松动,以往生活在乡村或郊区的“非城市人”开始涌向

城市,他们的生活环境和生存方式不断被城市所强化,乡村痕迹在物质层面上逐渐被剔除。虽然渴望凭借强大的经济实力抹去乡村印迹,培养出符合城市气质的现实感,但是这些城市移民者的精神世界中保留的乡村记忆仍会潜移默化地影响到他们的现实生活。“思乡”构成了其对某种乡村精神的记忆,表现出同金钱利益、冷漠封闭等城市特性截然不同的田园式旨趣,这是一种简单质朴、悠然恬淡的乡村情结。一种淡然无形却无处不在的乡村记忆是应对城市压力的缓冲机制,它直接体现为对城市空间中旧式建筑的尊重和挽留。这些古建筑凝聚着过去时代的精神特质,成为不可被符号化的空间,同“恋根”的乡村记忆交织在一起。在城市中,空间组合向经济建设转移的同时改变了以往的居住环境和过去的生活方式,高科技的飞速发展、便利迅捷的交通设施、琳琅满目商品促动的消费热潮、形形色色的视觉刺激等不断生成的符合城市要求的现实感改变了原来城镇文化中的乡村情结,使温润平淡的乡村主义消逝在激进的城市化浪潮之中。城市在各阶段的发展历程借由记忆的完整得以延续,关于旧式空间持存的渴望意味着现代人对竞争激烈、麻木乏味城市生活的抵挡和对抗,也是其对现实的怅然和对生存的恐惧合情合理的心理需求本能。

齐美尔认为与资本主义货币经济捆绑在一起的城市空间在生存模式与生活意义的知觉度量方面有着与乡村生活截然不同的状况。在高峰现代主义熏陶下彻底商业化了的都市景观已经与平缓、宁静、纯洁的乡村精神状态相去甚远,“大都会以其街道的纵横交错以及经济、职业和社会生活的发展迅速和形态多样,造成了它的心理环境。”^③城市性格诞生于理性化的城市空间设计之中,城市人群需通过理性意识的强化来对此空间作出反应,然而这种观念却常常将对技术理性的依附逐步转换为人性中冷漠

① [美]马歇尔·伯曼《一切坚固的东西都烟消云散了——现代性体验》徐大建、张辑译,商务印书馆2003年第15页。

② 此为中文译名,其英文版为Georg Simmel,“The Metropolis and Mental Life,” in Donald N. Levine, eds., *On Individuality and Social Forms*,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71.

③ 薛毅主编《西方都市文化研究读本》第2卷,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年第92页。



苛刻式的麻木。这种自我意志的遮蔽或变异是对城市生存空间特有焦虑感、压迫感、虚无感的顺应,也是以畸变自然生命为前提获取技术理性的代价。但是对城市的体验和描述不可能简单地用一种修辞姿态将其视为抑制性的聚合体,恰恰相反,城市空间的多元复合性、人口栖居的多样性以及城市发展的灵活性亦成为延续和更新城市历史和人文价值的关键质素。波德莱尔作为一名寓言诗人,创造性地借助城市景观抒发城市现代性体验显性与隐性的特质。他曾在其长篇散文诗《人造天堂》中关于一间房子有这样的描写“您看到这有点像高级的笼子,一只很美的笼子关着一只很大的鸟。……但是栅栏使我想我是在一个笼子里或一座四面都向着空间开放的风子里,把我与这些美妙的东西隔开的只是我的华丽的监狱的栅栏。”^①在其散文集《巴黎的忧郁》中也有类似的叙述“用钥匙在锁孔里转两圈,我觉得这一转更增加了我的孤独,加固了把我和这世界分离的围墙。”^②在波德莱尔的描述下,城市物理空间融合人类心理空间共同建构着现代化城市的特质和文脉。本雅明生前未完成的“巴黎拱廊街研究”,通过唤回记忆的敏锐洞察,将现代空间建筑现象同现代人典型心理体验融合在一起。现代人的生活就是茫茫人群中的你来我往,由拱廊街现象出发,就是要揭示现代化进程中个体自我失落的精神实质。是城市塑造了人,还是人建构着城市?个体作为城市的基础组成单位,将深思熟虑的文化引入城市建构的各个角落,将个人和集体的记忆交织成“场所精神”,转化为一个城市的历史。城市的出现很大程度上得益于人类整体性合作,而这种合作正是由于现代化集体思想凝聚才得以实现的,由此可见,城市的发展始终暗含人类想象和实践的痕迹。

城市作为人造产物,它的形象在不同社会地理层次和时间结构之间呈现出发展的不确定性,并不断构成新的外部形象和文化脉络。城市作为人类居住空间的聚汇之所,其内涵早已超越物理结构范畴,它是人类发展至今所创造的最好的记忆媒介,关联着人类自我理想、核心智慧、审美倾向,必然充盈的是人类生存体验及文化记忆。记忆不仅是回溯性地探索感性诗意的原始景观而被深埋起来的认知内

容,亦可作为一种生产性的创造力量随着时代的趋进而构成城市文化的基本蕴藉。然而,城市面貌瞬息万变,没有什么词语比“流动性”更能确切地描述我们身处的时代,现代性连续的、永不止息地加速趋向未来产生了现时代特有的焦虑症与虚无感。现代性对持续加速的耽溺强行改塑着人的自然生命节律,在一个始终指向未来的直线进步时间推动下,记忆的更新换代比任何时候来得都要猛烈。时间成为现代化的生存论基础,而记忆伴随时间永无休止的流动成为一个不断生成的动态概念。逐新厌旧的现代性生产-交往节奏的确对回返性质的记忆产生了不小的冲击,瞬息流变的时代特质不断消解着记忆的深度,造成信息获取的分散化、碎片化和浅薄化。记忆的群体性衰弱诱发其在时间维度上的浅层化,愈益加速的时间之流夹带着现代社会永不凝滞的功利需求消解了积淀性记忆,取而代之的是一种变异后的消费性记忆。一切坚固的东西都烟消云散,记忆被重新规划改写,记忆危机已然成为无法回避的问题,因此确保记忆的完整性和充实性应该成为当务之急。“文化记忆的最终目标不是对以往的人或事形成一个客观的认识,而是把过去构建为能够支撑当下和指明未来道路的共识”^③文化记忆以其实用性和现实性具有为未来道路奠定基础的功能,发现记忆层面的困境才能引向更深层的精神信仰反思,这就需要时刻秉持建设性姿态下的精神重建,但同时也需要诸多学科的介入和共建。虽然对于记忆的研究和思考有迂回顿挫,但不失时机地补偏救弊才能使趋于优化的记忆力量与时偕行。

作者单位: 陕西师范大学民族教育学院

责任编辑: 魏策策

^① [法]波德莱尔《人造天堂》,郭宏安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11年,第57~58页。

^② [法]波德莱尔《巴黎的忧郁》,亚丁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4年,第36页。

^③ 金寿福《扬·阿斯曼的文化记忆理论》,《外国语文》2017年第2期。

